

§ 文明探源 §

文化传播、萨满教“底层”与早期中国文化格局

——童恩正“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再思

赵德云

摘要: 20世纪80年代,童恩正注意到由东北至西南这一半月形地带内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器时代存在若干文化因素上的相似性,提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概念,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现有考古资料表明,这一地带文化因素的相似性并非都是由文化传播导致,萨满教“底层”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而“文化传播带”的命名,容易让人对这些共性出现的原因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建议将其命名为“边地半月形带”或“童恩正带”。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提出以来,不断有学者在其基础上试图补充修正,使得我们越发清晰地认识到,这一概念事实上与整个东亚大陆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格局及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边地半月形带;文化传播;萨满教

中图分类号: K851; K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23) 03-0028-12

1986年,童恩正提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通过石棺葬、大石墓-石棚、火葬等葬俗,以及石头建筑遗迹及细石器、球形石器、圆形穿孔石器、条形石斧或石锛、半月形石刀、石范、滇文化动物纹、曲刃剑、长骹曲刃矛、双大耳罐、双饼形茎首青铜剑、扁平钩形格青铜剑、联珠钮饰、双联罐和仿制中原地区青铜鬲等多种器物,论证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中国由东北大兴安岭经阴山、贺兰山、祁连山等山脉折向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这一半月形边地存在考古学文化因素的相似,并通过生态环境的相似以及不同经济类型的部族集团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探讨这一传播带产生的原因。^①该文是童恩正长期从事西南考古的集大成之作,^②入选2019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③被认为是理解文化接触和交流的“理论性贡献”。^④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概念的提出,是基于考古材料试图为考古现象的解释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但30余年来,其产生的影响远超考古学范畴,在历史学、民族学等相关领域亦引起较大反响。在考古材料又有极大丰富的今天,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一概念的合理内涵,补充和修正其部分内容,将成为促进考古学及相关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可能契机。本文拟梳理这一概念的基本思路及理论根基,辨析“文化传播”在边地半月形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讨论这一地带的萨满教“底层”及其对认识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的价值。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赵德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成都 610064)

①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7-43页。以下引用该文不再注明出处。

② 李水城:《记考古学家童恩正》,《中国文化》2021年第53期。

③ 李伯谦、陈星灿主编:《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④ Anke Hein, “Introduction: Diffusionism, Migration, an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Chinese Border Regions,” in Anke Hein, ed., *The Crescent-Shaped Communication-Contact Belt: Tong Enzheng's Model in Retrospect*, Oxford: Archaeopress, 2014, p. 1. 2012年在日本福冈召开的第五届东亚考古协会(SEAA)世界会议上,安可(Anke Hein)召集了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作为讨论主题以纪念童恩正的分场,会后出版了这本论文集,收录中外学者论文9篇。

一、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本思路及理论根基

在序言中，童恩正化用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C. Wissler）《人与文化》一书“文化特质”（Cultural Trait）和“特质综合体”（Trait-complex）等概念，^①提出他对考古学上“文化因素”的认识。尽管理论来源不同，其要义与大体同一时期俞伟超、^②李伯谦^③等提出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并无本质不同，都强调其是由具体的物质（遗迹、遗物）所显示或代表。但由于论述的内容牵涉广阔时空范围，他并未从单一考古学文化内部分析着手，而是从不同考古学文化中选择具有共性的若干文化因素进行对比研究。

童恩正举为例证，用以说明从东北到西南边地存在联系的诸文化因素，都是他在长期的考古实践中颇为熟稔的事物。其师冯汉骥1938年在汶川萝葡岩发掘一座石棺残墓，1964年派遣童恩正再赴岷江上游，清理20余座石棺墓，后来二人合作将两批资料合并发表，^④是为西南地区石棺葬发现与研究的开山奠基之作。西南地区大石墓的正式发掘，则肇端于童恩正主持发掘的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⑤其后他又主持清理凉山州喜德县拉克公社大石墓，^⑥并就大石墓墓主人的族属问题开展专题研究。^⑦半地穴式石墙房屋和石墙基、圆石台、石围圈等建筑遗迹，以及细石器、球形石器、半月形石刀、双联陶罐等遗物，则大量见于其主持发掘并撰写报告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⑧双耳陶罐及滇文化动物纹、曲刃铜剑、长骹曲刃铜矛以及川滇西部出土的双饼形茎首青铜剑、扁平钩形格青铜剑、联珠钮饰等器物，或常见于他亲自发掘的滇文化墓葬、大石墓或石棺墓，或是他开展过专题论述。^⑨田野实践和研究工作中的体会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最终构成了这篇带有宏大构思、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经典之作。

在“结论”中，童恩正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能力，指出边地半月形地带内呈现某种文化同一性的原因，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其生态环境。尽管纬度不同，但“半月形地带的高度呈阶梯状递增，呈现出一种纬度高地形低，地形高纬度低的互为补偿的自然条件”。接着他从太阳辐射、气温、降水量、湿润程度、植物生长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论证该地带在自然条件上的一致性，即基本由高原灌丛与草原组成。他进而指出，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这半月形的地带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他们的风俗习惯紧密联系，使得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传播得以顺利进行；在需要迁徙的时候，往往也是选择与自己习惯的环境相似、居住着与自己经济活动相同的民族的地区，从而更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文化的共同性。可以看到在论证过程中，童恩正主要是将考古学文化放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多学科考察。

有学者认为在强调生态环境之前，童恩正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人类行为，其一是族属，其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⑩转变发生的原因，应该与童恩正1981年赴哈佛大学访学有关。其1986

① 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钱岗南、傅志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7-50页。
 ② 俞伟超：《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武汉：荆楚书社，1987年，第1-15页。
 ③ 李伯谦：《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文物报》1988年11月4日，第3版；李伯谦：《感悟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④ 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⑤ 四川省金沙江渡口西昌段、安宁河流域联合考古调查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5期。
 ⑥ 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⑦ 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
 ⑧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⑨ 如青铜剑可参见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⑩ 查小英：《从民族史到人类学——童恩正西南考古的参照系》，《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5期。

年先行发表的《人类文化与生态》^①一文已经反映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主要思想,只不过后来就特定地域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当时正在一同撰写的应该还有《文化人类学》,从他本人所撰序言看,该书在1987年杀青,1989年出版。^②这本“继林惠祥教授之后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二部文化人类学专著”^③用不少篇幅讨论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人类的生计经济。可以推想1981年以后,他用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钻研文化人类学,从后来的研究实践看,生态环境对古代人类的影响应该是他着力最多的内容,到1986年以后,结出一批硕果,^④他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研究取向及能力的“转型与升级”,并且引领了学术潮流,^⑤被认为是“人类学派的考古学家”。^⑥

对童恩正这一学术转变产生影响的应该还有蒙文通。蒙先生曾分析公元前9世纪至3世纪全国主要少数民族迁徙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的加剧。^⑦童恩正对此尤为欣赏,指出“尤为难得的是,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蒙先生即能突破旧学窠臼和学科的局限,采用交叉学科互证之法,全面地分析社会问题,……但这种用生态环境的急骤变化来解释某些历史现象的观念,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就是现在看来也是合理的。……蒙先生这种全面考察社会的方法,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启发”。^⑧这个启发,无疑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同时不能忽略的是,西南地区地貌特征和自然景观复杂多样,孕育出面貌各异的民族文化。即便是对于游历者而言,都必定印象深刻,对于童恩正这样训练有素、卓有思考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自然更是体会良多。他的田野考古和民族学调查,^⑨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巴山蜀水、云贵大地及横断山区都曾留下他的足迹。^⑩这些经历,应该也是促使他在考察古代文化时注重生态环境,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思考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

生态环境之外,童恩正亦强调了社会方面的原因,即从不同的人类集团互相适应的关系中加以考察。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黄河中下游的农耕民族与长城线以外的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经济类型、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各个方面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进入铜器时代以后,在华夏族中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从行动上阻止了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部民族的东进,从思想上限制了他们文化的传播。当北方或西南边陲的民族需要迁徙时,由于这种人为的压力,往往只能顺长城及青藏高原东部移动。

童恩正的上述论述,实际上含有“文化认同”的内容。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以弗雷德里克·巴

① 童恩正:《人类文化与生态》,《民族学与现代化》1986年第2期。

②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该书收入《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8年)时被列为《人类与文化》的一部分。

③ 范勇:《童恩正先生与西南考古》,《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

④ 童恩正受文化人类学影响和启发的论著,举其要者,尚有《摩尔根的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考古》1989年第3期;《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首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中国古代的巫》,《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等等。

⑤ 1987年,童恩正为《南方民族考古》撰写的“发刊词”《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页),突出强调了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及结合民族史、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相邻学科开展考古学研究的必要性。

⑥ 陈星灿:《童恩正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李伯谦、陈星灿主编:《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12页。

⑦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

⑧ 童恩正:《精密的考证、科学的预见——纪念蒙文通老师》,《文史杂志》1985年第1期。

⑨ 童恩正的民族学调查,以与李绍明等开展的雅砻江流域民族考察最为集中和重要,参见李绍明、童恩正主编:《雅砻江流域民族考察报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他在民族学领域的贡献,参见李绍明:《童恩正对民族学的重大贡献》,《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⑩ 童恩正的田野经历,可参见罗开玉:《童恩正先生的学术贡献》,《南方民族考古》第十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20页;Lothar von Falkenhausen,“The Life and Work of Tong Enzheng,”in Hein, ed., *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pp. 31-32, 35.

斯 (Fredrik Barth) 为代表的族群或族群边界主观认同理论。^① 作为该理论奠基之作并在社会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文集早在 1969 年就已经出版, 但童恩正应该并未涉猎, 在所述他的《文化人类学》中只字未提, 在他毕生的论述中, 也未见有相关内容。可见他是以史学的眼光, 独立发明这一观点, 而非如同对生态环境的强调是受到西方人类学的强烈影响, 与其后王明珂自觉地运用主观认同理论构建“华夏边缘”截然不同。^②

按童恩正自己的说法, 他是将考古学文化放在一定的生态环境、社会背景下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提出一些问题, 以增进对古代社会现象的全面了解。就其后的反响看, 这一目标无疑是成功的。

二、“文化传播”对边地半月形带文化相似性形成的作用辨析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概念提出以后, 在探讨这一地带内不同区域若干器物或文化因素相似或趋同现象的时候经常被引用。毋庸讳言的是, 一般是将其作为一个可以信手拈来的依据, 用以论证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某种传播关系。这或许是这一概念的命名落脚于“文化传播带”, 或多或少让人误解相似性都是由于文化传播所带来的。^③

童恩正在“结论”开头即明确指出: “我们并不想简单地将这些联系全部归结为民族间直接迁徙或交往的结果。因为在这纵横数千里的空间、上下几千年的时间之中, 单纯依据这些薄弱的材料, 是难以勾画出一幅边地民族移动的全景的。我们的初步看法是: 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 其中既有民族的直接迁徙、融合和交往, 也有间接的观念的传播, 甚至不排除某些因素有两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这无疑是十分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从《文化人类学》中对传播论学派的评述、文化变迁中传播的方式及选择等论述^④看, 他对传播论对研究人类文化的作用及弊端有着比较全面和清醒的认识, 绝非“泛传播论”者。罗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也指出, 对于人群迁徙、军事征服、远距离贸易、激发性传播或者其他各种复合因素在区域间联系中发挥的作用, 童恩正绝不拘执一端, 总是对多样化的解释保持开放态度,^⑤ 这的确是童恩正治学的重要特点。

就具体涉及的诸文化因素而言, 童恩正大多仅是论证不同区域发现物的相似性, 除了半月形石刀“就其时代来看, 是西南早而东北迟, 其间自不能排斥由南到北文化传播的可能性”之外, 唯一较详细论证传播关系的是石棺葬。在概述了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石棺葬当时的发现情况, 并对不同地区的石棺葬年代进行分析之后, 他总结说: “就现有资料而言, 发现的石棺葬以西北地区最早, 西南次之, 东北又次之。这三个大区虽然相隔甚远, 但石棺的结构却惊人地相似。我们似有理由推测, 石棺原为黄河上游某一氏羌系统的民族 (其中以氏族的可能性较大) 所采用的一种葬具, 以后才传播到‘西南夷’和东北的‘胡’、‘戎’诸民族中去的。”

以今天材料的情况审视上述结论, 最容易注意到的是, 中国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大区石棺葬的年代序列已经完全颠转。现今中国范围内年代最早的石棺葬发现于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第二期

① 关于族群边界与族群边界理论, 可参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 李丽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年; 王明珂:《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及族群认同》, 台北: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 第32-36页。

② 王明珂:《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及族群认同》;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 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2003年。

③ 安可对此也有类似意见和分析, 参见安可:《文化传播、人群移动和文化影响: 以西南地区与北方草原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例》, 陈心舟译,《南方民族考古》第十一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年, 第67-90页。

④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人类与文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8年, 第25-28、290-298页。

⑤ Falkenhausen, “The Life and Work of Tong Enzheng,” in Hein, ed., *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p. 34.

甲类遗存,^①一般认为属兴隆洼文化一期,年代约在距今7500—6500年前。^②这个年代远早于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石棺葬。

西南地区的石棺墓,如云南元谋大墩子,^③云南永仁菜园子、^④磨盘地、^⑤维的^⑥以及四川会理小营盘^⑦等石棺墓地,被认为属于大墩子文化,根据碳十四数据,年代大体在距今4403—3259年的范围之内或稍晚。^⑧大墩子遗址最新的测年结果表明年代约为距今4000年前后。^⑨此外,四川汉源县麦坪遗址2007、2010年均发现石棺墓,前者地层关系明确,年代定为距今5000—4500年之间,^⑩后者则在距今4500—4000年之间。^⑪四川昭觉县四开乡各则羊棚地点发现的石棺墓,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年代在公元前2050—1670年之间。^⑫邻近的濮苏波涅地点的石棺墓,^⑬出土遗物文化面貌一致,年代当相差不远。

近年来由于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等大型工程建设,在四川会理猴子洞、^⑭云南元谋丙弄丙洪^⑮等遗址又有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墓发现,年代或可早至距今4500年,且墓地附近均有同时期居住址,随着资料的正式公布,对西南地区早期石棺墓渊源的认识还会进一步丰富和具体。

而西北地区的早期石棺墓,童恩正依据的青海民和县境内的一批发现,属于辛店文化甲组遗存,时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远远晚于东北和西南地区的发现。就今天的发现和认识而言,西北地区还存在更早的石棺葬,如景泰张家台、^⑯兰州焦家庄、^⑰同德宗日^⑱等地的发现,均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年代大体被定在距今4400—4000年之间。此外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也有发现,属于龙山文化,可能已经进入夏纪年。^⑲

- ① 索秀芬、郭治中:《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一期遗存及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8—100页;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0、501页。
-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0页。
- ③ 姜楚:《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墓葬清理简报》,《云南文物》1994年总第38期。
- ④ 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管所、云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永仁永定石板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7期。
- ⑤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工作队等:《云南永仁菜园子、磨盘地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 ⑥ 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永仁维的石棺墓地发掘记略》,《云南文物》1986年总第19期。
- ⑦ 昆明市博物馆、禄劝县文物管理所、凉山州博物馆、会理县文物管理所:《金沙江中游地区两处新石器时代石棺葬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1期。
- ⑧ 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滇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7页。
- ⑨ 金和天、刘旭、闵锐等:《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江汉考古》2014年第3期。
- 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县麦坪新石器时代遗址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
- ⑪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县麦坪遗址B区2010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0年第1期。
- ⑫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昭觉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昭觉县四开乡石棺墓地的清理》,《考古》2016年第8期。
- ⑬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昭觉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昭觉县好谷村古墓群的调查和清理》,《考古》2009年第4期。
- ⑭ 刘化石:《四川会理猴子洞石棺葬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1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55—59页。
- ⑮ 周毅恒、闵锐、车德才:《云南元谋丙弄丙洪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39—41页。
- ⑯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3期。
- ⑰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兰州焦家庄和十里店的半山陶器》,《考古》1980年第1期。
- ⑱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
- ⑲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广电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韩家圪旦地点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可见就现有的发现看，西北地区最早的石棺墓不早于西南地区，极有可能还要晚一些。我们不能简单地调转传播次序，将西北和西南地区石棺葬的出现归结为东北地区传播的结果，就认为解决了问题。有学者已经指出，仅从石棺这一被分离出来的文化因素来看，其分布从广袤的欧亚草原到南亚次大陆，绵延整个欧亚大陆的史前至历史时期，没有理由将其限定在国境之内。^①如蒙古与外贝加尔地区就十分流行。^②即便就国内的早期发现而言，江苏灌云大伊山墓地两次共发掘62座石棺墓，年代距今约6500年；^③此外还有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M458^④等，年代均较早，且不位于边地半月形带，如此复杂的情况，已经不能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来概述其渊源和传播了。

童恩正曾经指出：“葬俗是一种上层建筑，……它既能随着本民族社会的发展和与其它民族的影响而改变，又具有一定的守旧性和顽固性。”^⑤西南地区的石棺墓，有不少多人二次合葬的情况，如四川昭觉濮苏波涅墓地和附城区、竹核区的石棺墓，凡能识别葬式者皆为二次葬，且多数墓不止葬一人，有的墓中葬有3~4人；^⑥在昌都热底砦、^⑦巴塘扎金顶、^⑧云南中甸县^⑨等地墓葬中也都存在多人二次合葬的现象。这与西北、东北地区石棺墓以单人一次葬为主的情况迥异，葬俗上的差异表明它们可能具有不同的来源。

关于西南地区大石墓-石棚，童恩正曾有讨论，认为大石墓主人是采用二次葬和氏族合葬的古代濮族，与邻近的蜀族大石崇拜意识结合以后，发展出独特的大石墓。^⑩虽未明言，但他倾向于认为大石墓是安宁河流域本地文化结合了外来文化因素之后发展起来的。最近的研究表明，西南地区大石墓可能出于滇西地区的今楚雄州境内，最早或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向西传播至大理地区，向北传播至安宁河流域，在后者得到较大的发展，而大理地区除了少数墓葬外，一直保持着较为原初的形制结构。^⑪就目前的发现与认识而言，尚无法讨论西南地区大石墓与东北地区的联系。^⑫

上述情况表明，石棺葬、大石墓-石棚和童恩正论及的诸文化因素，以及后来学界探讨的内容，^⑬在这半月形地带上的相似性的确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在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肯定有一些文化因素存在传播的现象，但并非全部。只有谨慎地分析它们各自的具体情况，对于相关问题的解读才能产生切实的推动作用。

无论如何，童恩正的重要贡献在于以宏大的视角，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共性的存在，并将这些共性与特定的生态和社会环境相联系。但“文化传播带”的命名，则容易让人对这些共性出现的原因产

① Lü Hongliang and Zha Xiaoying, "Rethinking 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ntact Belt," in Hein, ed., *The Crescent-Shaped Communication-Contact Belt*, p. 51.

② A. Д. 策比克塔洛夫：《蒙古与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孙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③ 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灌云大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灌云县博物馆：《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1986年的发掘》，《文物》1991年第7期。

④ 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子镇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59年第11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⑤ 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

⑥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四川昭觉县好谷村古墓群的调查和清理》，《考古》2009年第4期。

⑦ 李永宪：《昌都县热底砦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42页。

⑧ 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

⑨ 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中甸县的石棺墓》，《考古》2005年第4期。

⑩ 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

⑪ 赵德云：《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分期及相关问题》，《考古》2019年第3期。

⑫ 关于东北地区的大石墓-石棚，可参见华玉冰：《中国东北地区石棚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⑬ 这方面的研究极多，无法亦无必要一一列举，如方辉：《东北地区出土绿松石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编：《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杨建华：《三叉式护手剑与中国西部文化交流的过程》，《考古》2010年第4期；向明文、滕铭予：《巴蜀文化墓葬出土铜刀文化因素分析——兼及巴蜀文化发展进程管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2期；田剑波、左志强、周志清：《试论金沙遗址出土早期铜戈》，《江汉考古》2018年第4期，等等。

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建议命名为“边地半月形带”,或者如同地理学界将胡焕庸提出的“瑗瑛—腾冲线”^①称为“胡焕庸线”一样,命名为“童恩正带”。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提出此建议,只不过着眼点有所不同。^②“童恩正带”与“胡焕庸线”都以自然条件为依据,对其在古代社会的重大作用进行高度概括,后者主要着眼于人文地理学领域人口与农业区域的分布,^③前者则用于考古学文化现象的解读。

三、萨满教“底层”:探讨文化相似性形成动因的新视角

如果边地半月形带(童恩正带)上文化因素的相似性相当部分并非由文化传播导致,而仅用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因素”的相近来解释,又似有过于笼统之嫌,难以让人尽释疑窦。

竿头饰是边地半月形带上较为常见的一种青铜物件,一般体形不大,上端多为动物形象(西南地区也有一些人物形象的例子),高常在5~10厘米之间,下端为圆釜(西南地区也有少数无釜,下为尖锥,用以栽插于柄端的例子)。关于这类器物的用途,很多学者认为是一种车饰。如乌恩指出动物纹竿头饰是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为生活所需而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器类,推测可能是车或其他某种实用物上的附件。^④朱凤瀚认为其是辕首或其他车上的竿顶饰物。^⑤在西南地区考古学界,还有仪仗用木杖之首、^⑥鸠杖的附属物、^⑦权杖头^⑧等不同意见。姑且不论其功用,其上的动物形象,正是童恩正“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论据之一。民族学调查中类似的资料可能可以为其功用提供线索,如凌纯声对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神杖”有所描述:“杖头有一铜偶,高约7cm,杖柄亦裹蛇,长114cm。萨满送魂到阴间时始用之,他右手持神杖,左手持神刀,平时总系刀向上,若与鬼怪对敌时,始将铜偶向上,铜偶威力甚大,能破坏一切的障碍物。”^⑨在西南地区的近现代民族调查中,至少羌族和纳西族巫师有使用“神杖”的记载,其基本形制、规格等与竿头饰及赫哲族“神杖”十分接近。^⑩结合出土情境,这类器物极有可能是萨满在送葬法事上使用的“神杖”。因此“西南夷地区与欧亚草原地带竿头饰的关系,应该是一种观念的传播或承继,而不是物品的直接流动,这种观念很可能就是两个地区共同存在的萨满信仰”。^⑪

我国古代岩画和彩陶文化中,有一种双手半上举,双腿半下蹲的人形,在岩画界和世界上古文化及考古领域被称为“蹲踞式人形”。除了岩画及彩陶之外,还广泛见于青铜器和玉石器等造型及纹饰。在世界范围内,对蹲踞式人形的内涵解读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汤惠生做了很好的概括,并认为有充分理由将其与萨满教中的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⑫有学者指出,广西左江岩画蹲踞式人形图案中有

① 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地理学报》第2卷第2期,1935年。

② 李飞:《“童恩正带”:土司制度与山地中国》,《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

③ 胡焕庸:《中国之农业区域》,《地理学报》第3卷第1期,1936年。

④ 乌恩:《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3-195页。

⑤ 朱凤瀚:《鄂尔多斯地区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综论》,《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9-90页。

⑥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94页。

⑦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223页。

⑧ 李昆生:《权杖·驯象长钩·图腾柱——云南考古三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刘弘:《古代西南地区“杖”制考》,《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

⑨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甲种之十四,1934年,第112页。

⑩ 葛维汉:《羌族的习俗与宗教》,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58页;赵心愚:《纳西族与古羌人渊源关系的又一证据》,《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⑪ 赵德云:《西南夷地区出土青铜竿头饰研究》,《考古学报》2018年第1期。

⑫ 汤惠生:《原始艺术中的“蹲踞式人形”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1期。

“腋下生子”的内容，反映了死而再生的美好愿景；^①对青铜兵器上的蹲踞式人纹的研究则表明，它们的载体应该是萨满在葬礼上使用的法器，纹饰本身可能和祖先崇拜、祈求死而再生等观念有关。^②

上述竿头饰和蹲踞式人纹两个个案，加上石棺葬、大石墓、大石盖墓^③等与萨满教所谓“石头崇拜”有关的遗迹，^④足以提示我们在边地半月形带之所以存在若干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背后还有相近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追求，即萨满教“底层”。^⑤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张光直关于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至三代社会特征及萨满教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意见，^⑥在国内外都引发了不少争议。^⑦我们不拟在这里全面述评，但即便作为批评者之一的李零也认为，张光直的论述是最富启发性的。^⑧正如罗泰所评述的，学者讨论这种见解的实质，往往变质为关于萨满教定义的喋喋不休的争吵，张光直讨论的实际的焦点问题——早期国家宗教和政权关系的解释反倒容易被忽略了。^⑨我们同意这一观点。汤惠生指出：“当代国际萨满教研究表明，萨满教是世界上唯一的原始宗教形态或曾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的原始文化综合体（primitive cultural complex）。只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的研究才能具有应有的广度与深度，从而揭示原始社会和原始文化的真相。”^⑩东亚大地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萨满教（或称巫）曾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⑪这大概没有多少学者会加以反对。

阻碍将边地半月形带上的文化共性与萨满教相联系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宗教学、民族学等领域关于萨满教分布地域的争议。长期以来，不少学者认为萨满教是亚欧两洲北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民族信仰的宗教。^⑫因此在中国西北及北方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已经将某些遗存与萨满教联系起来，^⑬

① 李飞：《魂兮归去：从贵州惠水仙人桥岩洞葬棺画论中国西南系统岩画》，《南方民族考古》第八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25-272页。

② 赵德云、杨建华：《西南夷青铜兵器上蹲踞式人形初探》，《文物》2020年第5期。

③ 大石盖墓常见于东北地区，具体情况可参见王嗣洲：《论中国东北地区大石盖墓》，《考古》1998年第2期。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四开乡俄巴布吉地点亦有发现，参见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四川昭觉县好谷村古墓群的调查和清理》，《考古》2009年第4期。

④ 汤清琦：《论中国萨满教文化带——从东北至西南边地的萨满教》，《宗教学研究》1993年第2期。

⑤ 萨满教“底层”一词，源于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其后被广泛使用，并发展出“文化底层”一词，指存在于不同区域中一种或数种来源相同、年代古远，并在各自文化序列中处于底层或带有底层特征的共同文化因素，参见段渝：《大禹史传的西部底层》，《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⑥ 参见张光直系列论著：《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商代的巫与巫术》，《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9-66、397-423页；《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三代社会的几点特征》，《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92-106页；《美术、神话与祭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九州学刊》1986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84-496页，等等。

⑦ 可参见萧兵：《中国上古文物中人与动物的关系——评张光直教授“动物伙伴”之泛萨满理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曲枫：《张光直萨满教考古学理论的人类学思想来源述评》，《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等。

⑧ 李零：《我心中的张光直先生》，《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81-83页。

⑨ 罗泰：《追忆张光直》，《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第262页。

⑩ 争议的相关情况，可参见汤惠生：《关于萨满教和萨满教研究的思考》，《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⑪ 据韩建业的研究，大约在8000年前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巫师一类专业的神职人员的地位逐渐凸显，奠定了此后稳定、连续发展的基础，参见韩建业：《早期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3-54页。

⑫ 相关情况可参见汤惠生：《关于萨满教和萨满教研究的思考》，《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⑬ 这方面的研究无法尽举，可参见宋兆麟：《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萨满遗迹》，《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1期；孟慧英：《考古与萨满教》，《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冯恩学：《试论萨满教宇宙观对解读考古现象的重要性》，《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等。也有不少结合具体材料进行探讨的个案研究，如王巍：《良渚文化玉琮刍议》，《考古》1986年第11期；乔虹：《浅析青海地区卡约文化的动物造型艺术》，《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巫人”的发现与“萨满教文明”的有关问题》，《文物》2008年第10期；曲枫：《大地湾骷髅地画的萨满教含义》，《北方文物》2011年第3期；全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2期；韩建业：《略论新疆地区四千年前的萨满式人物形象——兼论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年代》，《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等等。

而南方地区尚为少见。汤清琦较早认为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东北至西南边地的半月形地带就出现了一条萨满教文化带,并延续到近现代,还结合考古发现进行了论证。^①近来这种状况又有所改观,有学者认为南方民族中有些民间宗教现象可归入广义的萨满教范围之内,^②有学者更进一步,深入讨论了南方民族萨满教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③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南方地区萨满教遗存的辨识必将愈加清晰。

如何界定萨满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认为,萨满教等于入迷术,包括与“神灵”的特殊关系、能进行巫术飞行的癫狂能力、飞升上天、潜入地下和对火的控制等。^④需要注意的是,主要根据人类学调查材料总结的萨满教特征,有的可能在考古资料中无法得到显现,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萨满教的表现形式也不会一致。以蹲踞式人纹为例,各地的构图形式各具特征,载体不一。北方地区常见于岩画,如大兴安岭、^⑤阴山、^⑥贺兰山、^⑦宁夏中卫、^⑧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⑨等地岩画。西北地区除了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等地点的岩画之外,^⑩还见于彩陶纹饰。^⑪西南地区则见于云南沧源、^⑫元江它克、^⑬麻栗坡县大王岩^⑭及广西左江岩画^⑮和青铜戈、剑、斧等青铜兵器纹饰。岭南及中南半岛则常见于钺,中原地区在青铜器皿上可以见到其身影。即便同属西南地区,滇文化最常见于戈,八塔台文化则见于剑、斧的占了相当比例。^⑯这表明作为原始宗教的萨满教的内涵及外在物化形式随着空间变化是有差异的。考古遗存是否与萨满教相关,不同地域的特点如何,需要今后结合出土情境,在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加以细致分析。

除了分布范围广阔带来的多元化之外,同样不能忽略的是萨满教流行时间极长,应避免将其作为没有时间刻度的研究对象的做法,充分注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具体到边地半月形带,就宏观层面而言,大多数文化因素存续的年代都在西周及以后,这或与萨满教在中原大地式微的年代关系密切。童恩正认为夏代开始,巫师的后继者祭师集团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知识分子集团,迨至西周,这一集团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战国以后,随着早期文明史的结束,他们的特殊政治地位也就一去不复返。^⑰由于这样的历史变迁,与萨满教有关的物质遗存在中原地区主流文化中逐渐消失,仅在民俗文化中残存身影,^⑱而边疆地区由于还保持着原初的萨满教信仰,遗留下具有相似性的物质遗

① 汤清琦:《论中国萨满教文化带——从东北至西南边地的萨满教》,《宗教学研究》1993年第2期。

② 色音:《萨满教与南方民族民间宗教比较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③ 王建新:《南方民族萨满教研究再议——从宗教学之功过谈起》,《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

④ 参见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段满福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4页。

⑤ 庄鸿雁:《大兴安岭岩画中的太阳崇拜与生殖崇拜——大兴安岭岩画的文化解析之一》,《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⑥ 盖山林:《阴山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⑦ 盖山林:《贺兰山巫师岩画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⑧ 周兴华:《中卫岩画》,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⑨ 盖山林:《巴丹吉林沙漠岩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⑩ 苏北海等:《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中所反映的生殖崇拜及裸体艺术》,周菁葆主编:《丝绸之路岩画艺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4-179页。

⑪ 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汤惠生:《青海史前彩陶纹饰的文化解读》,《民族艺术》2002年第2期。

⑫ 汪宁生:《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⑬ 杨天佑:《云南元江它克崖画》,《文物》1986年第7期。

⑭ 杨天佑:《麻栗坡大王岩崖画》,《云南民族文物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04-107页。

⑮ 王克荣等:《广西左江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覃彩銮等:《左江崖画艺术寻踪》,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页;黄亚琪:《广西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般认为,广西左江岩画属于西南系统,参见陈兆复:《古代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⑯ 相关情况可参见赵德云、杨建华:《西南夷青铜兵器上蹲踞式人形初探》,《文物》2020年第5期。

⑰ 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⑱ 如蹲踞式人形直至今天仍可在民俗文化中见到,常被称为“抓髻娃娃”,载体常为剪纸,也有面花、蜡染织物等。参见靳之林:《中华民族的保护神和繁衍之神——抓髻娃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存，以今天的考古材料观察，就会见到环绕中原地区的半月形地带存在具有相当共性的文化图景。

上述文化变迁的过程尚需更多研究进一步揭示细节，但无疑提供了理解半月形文化带乃至早期文明格局除生态环境和文化认同之外的另一种可能视角。

四、边地半月形带对认识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的价值

童恩正所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北段，即转折向横断山脉以前的地段，在中国学界一般称为“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①也有在其内部细化为南、北两条文化带的尝试。^②或将其与西北方向中国境内草原地带统称为“北方草原”，与广阔的欧亚草原相联系。^③这一地段内文化因素的共性是久已讨论的话题，相关发现与研究均极为丰富，兹不赘述。童恩正提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实际上是立足西南，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都是从西南地区的角度提出来的。其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将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资料与研究已经较为充分的北方长城沿线联系起来通盘考虑。

据段渝转述，许倬云认为童恩正所划的这条传播带，还应该向南北两头延伸，向北应越过长城以北草原地带，向南应该延伸到中南半岛，这实际上是一条国际文化交流传播带。^④许倬云应该是注意到童恩正列举的各种文化因素，分布范围并不仅在边地半月形带上。西南地区也有学者注意到，在我国西部及东北地区存在一个巨大的呈“X”形的文化传播带，其东弧线即是“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西弧线从帕米尔高原开始，经过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通过河西走廊、陇中高原，在甘肃南部与东弧线汇合之后，南折经横断山区，越过金沙江后通过滇西地区翻越高黎贡山到达云南西南边境。^⑤李零提出，中国沿海也是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沿海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夷、越文化。北中国海，渤海和东海，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是夷的天下；南中国海，黄海和南海，从浙江到越南，是越的天下。^⑥李零没有就沿海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成因和内涵进行具体论证。陈民镇又在李零的基础上，强调“长江-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⑦

无论是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向南北两端延伸还是以“X”形的文化传播带来观察，抑或东部沿海地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都忽略了童恩正边地半月形带的界定，首先是基于生态环境相近，不能单纯依据文化因素的相同或相近来予以扩展；其次，这种扩展也达不到全面概括的目的，因为边地半月形带所联系的，是辽阔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相近的区域是一个“面”而非“带”；第三，“边地”是相对于中原，亦农亦牧，在生业形式上属于游牧和农耕的过渡地带，边地半月形带应该是客观存在的特定地域。

不过，李零提出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确实颇具启发意义。前面我们已经提及东部沿海地区的石棺葬，在浙江一带还存在大石墓-石棚和大石盖墓，^⑧杨楠认为虽然它们在造型上与东北地区同类遗存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构筑特点却不尽一致，在随葬遗物方面更是判然有别、

① 可参见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2003年新14期；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等等。

② 单月英：《东周秦代中国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兼论戎、狄、胡与华夏之间的互动》，《考古学报》2015年第3期。

③ 相关情况，可参见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匈奴时期》，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④ 段渝：《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⑤ 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09-570页。

⑥ 李零：《我们的中国》第一编《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23-24页。

⑦ 陈民镇：《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勾勒出“最初的中国”——几种关于“中国”的论著读后》，《中华读书报》2017年2月8日，第10版。

⑧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瑞安市文物馆：《浙南石棚墓调查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各具特色,因此不能断言两地墓葬结构的相似性就一定是文化传播的结果。^①最近李新伟主要通过玉器、筒形器、大口缸、钺、象牙器等器物,讨论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与红山文化存在文化共性。^②我们不拟详述东部沿海地区与边地半月形带存在共性的文化因素,仅强调二点。其一,东部沿海地区的考古遗存尤其是良渚文化,可能也与萨满教存在联系,近年来相关讨论日趋丰富。^③汤惠生明确指出,只有我们把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凌家滩遗址、薛家岗遗址等所出玦、阙、凹穴以及蹄印岩画纳入古代萨满文化的背景中、纳入古代天和通天的相关理论体系中考察时,产品与观念之间、考古资料与文献之间等等,可能才会呈现出更多的一致性。^④其二,如同边地半月形带外联欧亚草原,东部沿海地区与“环太平洋文化圈”^⑤亦存在密切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张弛论述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原核心地区的衰落和处于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的兴起,认为没有欧亚全球化带来的半月形地带的兴起,没有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的衰落,就不会有夏商周三代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历史。^⑥这一观点与同年英国学者罗森夫人(Jessica Rawson)提出的“中国弧”(China's arc)概念颇有相通之处。所谓“中国弧”是指介于中原和草原之间、在气候上更接近草原、不像中原地区能够发展集约农业的弧形地带,内部地形复杂,包括高地、荒漠、可以发展农业的盆地及北方森林地区。从文化面貌上来看,具有三个特征:(1)兵器、工具和装饰品与草原地区的联系比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密切;(2)青铜容器多是中原地区制品,通过贸易或掠夺而来,纺织品也是如此;(3)中原地区的铅锡青铜合金也被大量接受。^⑦其对童恩正理论的修正,主要在于指出许多文化共性,如塞伊玛-图尔宾诺式(Seima Turbino Phenomenon)倒钩铜矛、各种青铜短剑和刀等,并不仅仅存在于边地半月形带上,而是广泛分布于辽阔的草原地带。两位学者的意见肯定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合理内涵,并有进一步的补充和总结,都突出强调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最近陈胜前将边地半月形带称为“生态交错带板块”,与东南板块、西北板块、海洋板块共同构成史前中国文明的四大板块,突出强调其枢纽作用,也是相同的思路。^⑧

上述新近的观点,实际上都是在童恩正“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础上合理的进一步阐发,一方面充分说明了这一提法的启发性和延展性,另一方面提出了在更广阔空间范围内考察文化共性形成原因,以加深我们对古代文明形成动因和格局特征的认识。这样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非一日之功可至。

五、结 语

在长期的田野工作和研究经验积累的基础上,童恩正以其宽广的学术视野,率先敏锐地观察到由东北至西南这一半月形地带内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器时代存在若干文化因素上的相似性。尽管对于

① 杨楠:《中国东北与东南地区古代石构墓葬的比较分析》,《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② 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③ 参见金人喜:《韩国神杆的起源和特征——与中国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中的神杆纹样的比较研究》,《韩国研究》第九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第10-28页;叶舒宪:《创世鸟神话“激活”良渚神徽与帝鸿——兼论萨满幻象对四重证据法的作用》,《民族艺术》2019年第6期;李新伟:《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图像的内涵及演变》,《文物》2021年第6期等。

④ 汤惠生:《玦、阙、凹穴以及蹄印岩画》,《民族艺术》2011年第3期。

⑤ 参见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册第二编《中国古代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第1-14页;汤惠生:《从实证到验证——〈跨湖桥文化研究〉读后》,《考古》2016年第9期等。相较于欧亚草原地带,环太平洋文化圈的研究尚不够充分,有待于今后开展更多的工作。

⑥ 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

⑦ J. Rawson, "China and the Steppe: Reception and Resistance," *Antiquity*, vol. 91, no. 256 (2017), pp. 375-388.

⑧ 陈胜前:《从四大板块看史前中国文明的演进与互动》,《光明日报》2021年9月8日,第11版。

其中的半月形石刀、石棺葬，他推测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但整体而言，他本人并未强调传播因素在边地半月形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新近的材料表明，中国东北、西北、西南三个大区石棺葬的年代序列已经完全颠转，他所推测的传播次序已经不能成立。不仅如此，葬俗上的差异表明不同地区的石棺葬可能具有不同的来源。但童恩正提及的各种文化因素在半月形地带上的共性确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建议将该地带命名为“边地半月形带”，或“童恩正带”。

依据学界对笄头饰、蹲踞式人纹等的个案考察，我们认为在边地半月形带存在若干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背后还有相近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追求，即萨满教“底层”。学界对萨满教及其在古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乃至争议，我们依然相信随着萨满教在西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地位下降，与其有关的物质遗存在中原地区主流文化中逐渐消失，边地半月形带由于还保持着原初的信仰，遗留下相关的物质遗存。在考虑边地半月形带的形成动因时，除生态环境和文化认同之外，开展“精神领域的考古学研究”，^①探求萨满教文化“底层”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无疑可以提供新的视角和认识。

我们认为，欧亚东部新石器时代以来若干文化现象的趋同，与其用传播的视角理解，不如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的共通、传承和变异这一更大的层面考察。边疆考古的重要性之一，应该是为中原地区考古资料理解以及在更大范围内观察文化图景提供参照和缺失的一环，正与孔子“礼失求诸野”有相通之处。倘如是，是否考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以及边疆民族对中原文化持续不断的向心力等宏观文化现象时，需要考虑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共同的文化心理，以及边地半月形带在中原与草原地区之间的缓冲、联系作用？也是值得今后关注的大问题。

尽管我们对边地半月形带的形成提出了上述推测，但应该意识到的是，人类文化是极其复杂的，不同区域文化因素共性的存在，应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我们并不排除在一些具体案例中，确实存在文化传播的状况。最近李新伟依据美洲印第安人人类学资料，认为中国东部沿海区域的若干考古遗存与红山文化的共性可从“上层远距离交流网”来解释，即社会上层通过亲身远距离旅行实现直接交流，^②亦可备一说。但交流的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实际上还是与共通的信仰分不开。限于目前资料的状况，相关研究还难以达成共识，多样化的解释和探索无疑是通向历史真实的必由之路。

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提出以来，不断有学者在其基础上试图补充修正，使得我们越发清晰地认识到，这一概念事实上与整个东亚大陆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格局及变迁密切相关。限于学识，我们不可能在本文中把所有问题阐述清楚。这里仅叙述我们学习童恩正经典之作的一些体会和联想，冀望有助于学界同仁开拓思路。今后在加强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相关问题的本来面貌庶几才会逐渐浮出水面。

(责任编辑：史云鹏)

① 李伯谦：《关于精神领域的考古学研究》，《感悟考古》，第149-154页；何弩：《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② 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